



当语言不再是家园：人机共言时代的返乡之路

——基于海德格尔哲学的考察

陈群志, 李月雯

(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 人机共言时代, 人工智能的介入可能削弱“诗意的言说”所承载的真实情感, 使“深思熟虑的思”流于肤浅, 甚至可能导致精神“无家可归”。立足海德格尔哲学, 探寻一条“返乡”之路: 夯实“大地”之语言根基, 焕发“天空”之原创精神, 建构“神性”之伦理规范, 并回归“凡人”之真实交往。此路径旨在引领人们在技术环境中智慧地与人工智能“共言”, 重拾语言的诗意与深度, 实现当代的“诗意地栖居”, 以守护人之为人的“存在之家”。

关键词: 人工智能; 语言哲学; 四方整体; 海德格尔

中图分类号: B516.5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6)02-0035-07

When language is no longer a homeland: The path home in the age of huma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speech

—A Heideggerian inquiry

CHEN Qunzhi, LI Yuewen

(School of Marxism,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huma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speech, the interven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y diminish the authentic emotion conveyed by "poetic saying", render "deliberative thought" superficial, and potentially lead to spiritual "homelessness". Rooted in Heideggerian philosophy, a "path of homecoming" is explored: to solidify the linguistic foundation of the "earth", to rejuvenate the original spirit of the "sky", to construct the ethical norms of the "divinities", and to return to the authentic interaction of "mortals". This path aims to guide people to "co-speak" intelligently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thereby rediscovering the poetic depth of language, achieving a contemporary "poetic dwelling", and safeguarding the "house of being" for humanity.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 fourfold; Heidegger

人工智能的语言能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 渗透人类的交流、信息获取和内容创造等领域, “人机共言”时代已然来临。区别于人机对话的单向指令——执行模式^[1], 人机共言是指人类语言实践日益依赖人工智能中介, 言说、理解与创作越来越多地在与人工智能语言系统的互动中完成, 进而形成

一种新的语言生存状态。现有研究对人工智能的语言能力进行了多维度审视, 既肯定其进步, 也指出了显著局限。例如, 有研究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究竟是在真正意义上“说话”, 还是仅仅在模拟语言模式^[2]; 另有研究聚焦如何使这些系统与人类的规范、价值观对齐这一复杂挑战^[3]。同时, 通过与人类表

现的比较,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在特定语言任务(如现代文知识掌握和表达规范性)上可能展现出优势,但在古诗文理解、情感深度和创造性等方面仍有不足^[4]。因此,现有关于人工智能语言认知与计算基础的研究^[5],在不断揭示其语言能力复杂性的同时,也愈发要求我们超越纯粹的技术评估,开展深刻的哲学反思,去追问语言对人类存在的根本意义。

在此背景下,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是存在之家”^[6]的深刻洞见,及其对理解人类栖居之内涵的启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当代回响。语言,在其本源意义上,并非单纯传达信息的工具,更是存在向此在敞开、真理得以显现的“澄明之境”,是精神得以安顿的“家”。当个体日益沉浸于数据模式驱动、缺乏生命体验浸润的语言环境时,是否正在经历“精神上的无家可归”? 荷尔德林曾描绘那种令人心醉的回归:“回到我熟悉的鲜花盛开的道路上,到那里寻访故土”^[7],这种对“故乡”的寻访,在人工智能语言的包围中似乎变得愈发困难。当语言的“家园感”面临被侵蚀的风险,“返乡”的内在需求与哲学吁求便显得尤为迫切。

本文试图立足于海德格尔哲学,特别是其语言观和诗意栖居思想,深入探讨在人机共言的现实中,个体如何通过有意识的语言实践和精神转向,重新寻回语言的家园感,实现当代语境下的“返乡”。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诗人的天职是返乡,唯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7]³¹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返乡”的天职不仅属于诗人,更属于每一个珍视精神家园的现代人。

一、“语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的哲学奠基

在海德格尔的哲思视域中,“家”是本真的栖居状态,是精神得以安顿的澄明之境。但在普通日常状态中,此在在世的基本状态并非安然的“在家”,而是一种在“畏”的现身情态中被揭示的“不在家”状态,即“茫然失其所在”之感^[8]²³⁸。正是在这种根本性的不安状态面前,此在日常表现为“沉沦”式的逃避。这种逃避深刻地影响了“话语”这一基本生存论建构,使其在日常生活中极易堕落为“闲言”。“闲言”的本质在于它“不以分成环节的领会来保持在世的敞开状态,而是锁闭了在世,掩盖了世内存在者”,并在此过程中自行确立权威——“事情是这样,因为有人说是这样”^[8]²¹⁴⁻²¹⁵。但“闲言”并不能穷尽话语的全部可能性。在其本真的、源始的角色中,话语能够敞开自身,从而让语言成为“存在之家”。在日常

生活中“人的所作所为俨然他就是语言的构成者和主人”,恰恰相反,“语言才是人的主人”^[9]¹⁵⁸。因此,人应当是语言的“看护人”,栖居于此“语言之家”中聆听存在的召唤,并在此熟悉的场域里与世界亲近,获得切近与归属。而当话语的本真角色被“闲言”侵蚀时,精神的漂泊与“无家可归”亦将随之而来。

面对“闲言”的侵蚀,海德格尔将“返乡”的希望寄予“诗意的言说”与“深思熟虑的思”,视二者为塑造“家”之精神内核的本源力量。“诗意的言说”具有“创建世界”的本源力量。荷尔德林等诗人之所以被海德格尔尊崇,正因为他们以诗言揭示了存在的光明。“诗意创作并不首先为诗人作成欢乐,相反地,诗意创作本身就是欢乐,就是朗照,因为在诗意创作中包含着最初的返乡。”^[7]²⁷此处的“诗”,是指能够“首度命名存在”、使先前被遮蔽的事物得以进入澄明之境的本源性言说。诗意的语言,以独特的节奏、意象和象征,为凡人的栖居确立“尺度”,揭示存在的真理,使“家”充满生命活力与意义光辉。当诗人以其敏感的灵魂捕捉到存在的微妙与深邃,并将其付诸语言时,便是在为“家”奠基,为精神的安顿开辟道路。与之相伴的是“深思熟虑的思”。这种“思”是一种面向存在本身的、追问式的、守护性的沉思。它致力于克服对“存在之遗忘”的遮蔽,烛照存在的意义,从而守护“家”的精神深度。这种“深思熟虑的人”,能够倾听诗之言说,“不会莽撞急躁地对付那种隐匿起来的,并且在诗的词语中得到保藏的发现物”^[7]³¹。这种“思”是一种“感谢”,是对存在之馈赠的领受与回应,需要宁静与耐心,以避免陷入技术理性的宰制。在海德格尔看来,“思与诗的对话旨在把语言的本质召唤出来,以便终有一死的人能重新学会在语言中栖居。”^[10]唯有当二者相互渗透、彼此滋养时,“语言之家”才能真正成为充满灵性、意义与诗意的“家园”。

这个“家”如何生成并得以维系? 海德格尔通过“筑造即栖居”给出了答案。他指出,“栖居乃是终有一死的人在地球上存在的方式”,而这种栖居的基本特征便是“保护”^[9]¹⁶¹。人并非因为筑造才栖居,而是因为其作为“栖居者”,才进行本真的“筑造”。这种本真的栖居,是对“四方整体”——大地、天空、诸神、终有一死者——的四重保护。终有一死者之所以能栖居,首先在于他们“拯救大地”,即“把某物释放到它本己的本质之中”,而非利用或耗尽;其次在于他们“接受天空之为天空”,任日月运行、四季轮转;再者在于他们“期待着作为诸神的诸神”,在希望

中等待神性使者的暗示,而非制造和崇拜偶像;最后,人作为“能够赴死”的终有一死者,承担并守护着自身的有限性。正是通过这种保护性的“筑造”,作为“效力承受者,开花结果者”的大地、展现“日月运行,群星闪烁”的天空、作为“神性使者”的诸神以及终有一死的人得以聚集并和谐共在^{[9]163-164}。一个真正的“家”,其本质就在于它能够成为这“四方”互动的场所,让它们相互映照,显现素朴的统一性。

二、“语言家园”的遮蔽:人机共言中“诗”的失落与“思”的迷途

在“人机共言”时代,语言交流模式正从传统的“人—人”或“人—机”互动,转向更为复杂的“人—机—人”模式。这种深刻的转变正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家”之精神内核不断侵蚀,使人陷入一种新的、技术性的“无家可归”之境。

(一)“诗意的言说”的失落:情感共鸣的消逝

人工智能情感计算及“人工情感”在服务与“内容创作”领域的广泛应用^[11],将“人—人”的沟通模式悄然转变为“人—机—人”模式。这一转变使得言说本身的“诗意”渐趋失落,从而导致情感共鸣的消逝。诗意言说之所以能“创建世界”,正因为它是在“共在”中建立信任与共鸣的本真方式,其力量根植于言说者与倾听者之间的内在信任与共鸣之上。它要求双方全身心投入与坦诚相待,是生命与生命的真实映照。它依赖于一种根本性的脆弱性——信任者甘愿向被信任者敞开,相信对方会以善意回应,而非利用这种敞开。马丁·布伯对此的阐释恰与此相呼应:“我—你”关系是一种主体间的、直接的、相互回应的遭遇,其中他者被视为一个完整且有尊严的“你”,而不是一个可供利用或分析的“它”^{[12]33}。

在人工智能“润色”或“代理”的介入下,这种“我—你”的相遇变得岌岌可危。当个体接收到人工智能“润色”或“代理”的语言时,便难以确定其源头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真实人格(你),还是由算法和数据驱动的模拟程序(它)。即便语言背后确有其人,人工智能的介入也使得这个人的真实面貌被遮蔽。个体不再是与一个完整的“你”直接对话,而是与一个被技术筛选、优化甚至伪造的“语言形象”进行互动。这种模糊性使得交流对象被视为一个“功能体”而非“生命体”,从“你”降格为“它”,剥夺了个体感知和判断对方“可信赖性”的关键线索。接收者无法通过真实的、未经修饰的语言去评估对方。如果对方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人工智能的

“优化”,那么这种“完美”反而可能制造出一种不真实感,引发接收者的怀疑:“这真的是TA想说的吗?”这种怀疑侵蚀了信任的基础,因为它破坏了交流的透明性和真诚性。

反过来,当个体通过人工智能“润色”语言发送给他人时,其也在一定程度上将接收者视为一个需要“优化”语言去“影响”或“满足”的客体(它)。此时,个体不再敞开心扉与对方进行真实对话,而是通过算法“投其所好”以达到特定效果。这种经由算法的“投其所好”,恰恰落入了一种非本真的“操持”模式。海德格尔将“操持”分为两种可能:一种是从他人身上接过“操心”,为他“代庖”;另一种则是“为他人生存的能在作出表率”,帮助他为自己的“操心”而自由^{[8]157-158}。在许多复杂的交往情境中,个体若直接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完美文本,便是非本真的“代庖”,它剥夺了个体亲身承担“操心”的可能。这不仅消解了个体与对方建立“我—你”关系的潜在可能,也可能使对方产生被操控或被敷衍的感觉。信任建立于双方的真实投入与对等尊重之上,一旦这种对等关系被人工智能的介入所打破,代之以效率或“完美”的追求,那么信任便难以维系。当“家”中失去了信任,人便如同漂泊无依的旅人。

(二)“深思熟虑的思”的迷途:认知深度的扁平

人工智能的介入不仅影响了情感联结,也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思考方式,使“深思熟虑的思”陷入迷途,认知深度随之扁平化。在传统的“人—人”对话中,思想通过共同的“语言劳动”——包括言语、倾听、回应和辩驳——得以共同生产,语言是双方智力投入与情感连接的鲜活的产物,体现了人类自由自觉的“类本质”^{[12]65}。然而,当“人—人”对话模式转变为“人—机—人”,人工智能作为中介,尤其是以提供“即时答案”的方式介入人类思考与交流时,这种转变便深刻地异化了“思”的本质,并显著降低了人际间思想交流的质量。

人工智能的即时答案能力,诱使个体依赖“思想捷径”,削弱了“深思熟虑的思”所必需的耐心和对不确定性的容忍。这种状态,恰是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沉沦”的日常样态,它通过三种相互关联的方式展开。首先,人工智能成为“闲言”的来源,以虚假的清晰度代替本真的领会。其次,这种即时知识迎合了“好奇”,鼓励永不“逗留”的浏览式认知,个体“贪新骛奇,仅止为了从这一新奇重新跳到另一新奇上去”^{[8]219},思考沦为对新奇刺激的被动接受。最终,这一切陷入了“两可”境地:当任何人都能生成看似

专业的文本时,真知与模仿的界限被抹平,“一切看上去都似乎被真实地领会了、把捉到了、说出来了;而其实却不是如此”^{[8]220}。

正是在“闲言”“好奇”与“两可”的交织中,人工智能生成的答案和观点成为一种异己的、物化的“思想产品”。人不再是思想的“生产者”,而是被动地消费由人工智能“生产”的语言。这种“劳动产品”不再属于个体自由自觉的创造,而是被外部技术逻辑所决定,成为一种外在于个体、甚至统治个体思维的力量。这使得个体对语言的感知和运用也日益工具化,削弱了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共同揭示真理的可能性。语言的丰富性和深度被压缩为高效传递信息的工具,其作为存在敞开之地的本真意义逐渐消逝。这种异化进一步物化了人际间思想交流的关系,将原本主体间、非功利性的对话,扭曲为一种“人一机一人”模式下的信息交换。其中,“机”作为中介,削弱了人与人之间通过共同实践相互确证、发展其“类本质”的可能性。这正是海德格尔所预见的危险:“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存在并且增长着一种危险,就是科学—技术的思维方式伸展到生活的一切领域上。由此加强了一种错误的假象,仿佛一切思与言都是客观化的。”^[13]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发展的产物,正是这种危险趋势的体现。它将思想本身纳入技术理性框架,使其被工具化和对象化,最终将人从语言的“存在之家”中驱逐出来。因此,一场精神上的“返乡”迫在眉睫,以重新寻回本真的存在。

三、“返乡”之路的践行:以“四方整体” 重塑人机共言时代的“语言家园”

接下来的目标是探索如何富有智慧地与人工智能“共言”,让“诗”的创生与“思”的深邃超越纯粹的技术性。这样的“共言”与精神转向,旨在引领人们在喧嚣的技术环境中重寻精神的“家”,努力迈向切实的“诗意栖居”,以此回应时代挑战,并守护人之为人的存在根基。海德格尔关于大地、天空、诸神、凡人相互关联的“四方整体”思想,为此探索之路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指引。

(一)扎根“大地”:语言根基的夯实

“大地”象征着语言赖以生存的、深厚的历史与文化根基。在人机共言时代,“扎根大地”不再仅仅意味着个体对语言传统的艰难守护,而是开启了一种人机共同挖掘语言根基的全新可能性。踏上这条精神返乡之路,首要前提是确立清醒的驾驭姿态:以人之为人的话语能力,引导和统摄人工智能强大的

语言处理能力,从而在这场共言的寻根之旅中,共同对抗语言的“闲言”状态。

这种共言,首先体现在对词语根系的深度挖掘上。“闲言”的本质是“除根的”,因为它“无须先把事情据为己有就懂了”^{[8]215}。要真正达到对词语“最广义”的“相当的认识”,恰恰需要“把事情据为己有”的艰苦过程。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言:“必须熟习它的用例,知道它在某一种场合才可以用,用在另一种场合就不对了,这才真个认识了。”^[14]在人机共言的语境中,这一过程被赋予了全新的维度:可以引导人工智能这个不知疲倦的语言处理者,在海量数据中系统性地构建词语知识图谱。人工智能负责呈现事实与关联,而个体则凭借自身的在世体验,进行话语层面的领会与阐释,将冰冷的材料转化为温热的体验,从而完成那不可替代的“据为己有”,让个体的言说重新扎根。

其次,这种共言也为洞悉语言的内在秩序与语境开辟了新视野。乔姆斯基提醒,若“过于追踪模糊不清的语义线索,会错过对语言结构的重要领悟和概括”^[15],而人工智能对海量文本的句法结构分析,恰能突破这一局限,使个体直观地观察到语言的整体秩序。同样,对于维特根斯坦所言的“语言游戏”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16]17},人工智能虽无法亲身参与作为“生活形式”的语境,但它能够系统性地梳理和呈现无数“语言游戏”的规则、范例及其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演变。在这里,人工智能作为强大的语言分析工具,为个体绘制出一幅宏观的地图;而个体作为话语的主体,可依托这张地图进行更具深度的“沉思之思”,领会语言结构与生活形式之间充满生命力的关联。

因此,在“扎根大地”的返乡之路上,人与人工智能的共言实践恰恰印证了海德格尔的洞见:“语言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是话语。”^{[8]226}人工智能的角色,正是在语言的层面展开,它极其擅长处理关于世界的模型与表征;而人的主体性与尊严,始终留存在话语的层面。正如 Dreyfus^[17]所言,人类之所以能避免人工智能的根本困境,是因为人类生活于其中的有意义的对象,并非一个存储在心智或大脑中的世界模型,而是世界本身。个体凭借这种直接的“在世”生存,进行着本真的现身与领会。是人,向人工智能提出问题;是人,对人工智能呈现的语言材料进行充满生命体验的阐释;最终,是人通过话语这一生存论活动,赋予材料以意义,并在此过程中聆听与沉默,实现真正的栖居。

(二)仰望“天空”:原创精神的焕发

倘若说“扎根大地”是回归语言家园的深度,那么“仰望天空”则指涉其无限的高度——即在人机共言的现实中,为原创精神与批判性思维开辟一片自由的疆域。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整合能力,极易生成无所不包的“平均领会”,它“把开展扭曲为封闭”,使“一切新的诘问和一切分析工作都被束之高阁”^[8]²¹⁵。因此,返乡之路在此处转向一种向上的努力:在与人工智能共言时,如何刺破“闲言”的穹顶,让原创的灵光得以闪现?

这要求个体在每一次言说前,首先确立一种“为自己做决定,而不是被决定”的本真存在姿态^[18]。以大学课堂的场景为例:当面对教师的提问,个体便处在一个抉择的路口。一种选择是为博取即刻的赞赏或学分,放弃艰难的独立思考,立即转向人工智能索要一个“标准答案”,从而放弃了“把事情据为己有”的责任,沦为一个转述数据平均值的“传声筒”。而另一种选择,是首先进入一种精神的“独处”状态。个体有意识地将注意力从外部的喧嚣中移开,将人工智能从一个被动的“答案来源”,主动地改造为一个辅助原创精神的“诘问者”。在独立思考后,他会向人工智能提出挑战:“我的初步观点是A,请你扮演批判者,提供反对意见。”随后,他甚至会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反驳”本身进行再批判:“你提供的这个反驳,其背后的立场和预设是什么?”通过这种螺旋上升式的“共言”,个体得以从“常人”的平均领会中抽离出来,从而清醒地认识到:日常平均状态中的语言时刻受到权力^[19]、意识形态^[20]、经济效用^[21]和社会结构^[22]的渗透。因此,批判性言说的真正目的,便在于穿透这层由“常人”话语构成的遮蔽,超越一个即时、完美的标准答案,从而守护自身思考的原创性。即便这意味着在课堂上保持暂时的沉默,那也是一种对“闲言”侵蚀的清醒抵抗。课后,这名学生带着经过审慎思辨或许仍不完美的想法,主动找到教师进行对话,从而完成了“人一机一人”模式的本真闭环。整个行动最终体现的,正是 Leavis 所指出的,语言作为“一种人类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一种创造性的反应”时所表现出的那种“连续的、合作的创造力”^[23]。

“仰望天空”并非终点,而是持续的抗争与超越。它要求个体在与人工智能共言的每一刻,都保持清醒的警惕与创造性的张力,并怀有一种本真的聆听能力:既聆听人工智能所呈现的广博知识,更聆听那些在“闲言”的喧嚣中被遮蔽的、等待被道出的真理。正是永不休止的向上追问,让人类的诗意栖居在家

园的天空下,始终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璀璨星辰。

(三)聆听“神性”:伦理框架的建构

这条返乡之路在向上追寻之后,必然要回应来自深处的召唤——那便是“神性”的召唤,它指向语言所内蕴的伦理价值、真理追求以及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在人机共言时代,为“共言”确立伦理规范,核心不在于构建外在规则,而在于唤醒内在的德性守护,以对抗在技术环境中可能发生的“道德去技能化”的风险。

人工智能作为中介,本身不具备理解力、同情心或道德感,它只是基于数据的推演工具。当个体决定将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作为自己的言说发送给他时,便完成了对文本的“伦理认领”,需对其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全部责任。这一自觉行动,本质是拒斥海德格尔意义上“闲言”的非本真权威——即那种“因为数据显示是这样”的无根基言说。如果人工智能的修改扭曲了个体本真的语气或核心观点,或其建议与内在价值准则相冲突,个体必须有意识地拒绝采纳。在学术研究与职业实践等要求高度诚信的场景中,若深度使用了人工智能,主动向对方说明情况,也是负责任的伦理姿态。这一切的践行,都有赖于个体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与道德涵养,从而在复杂的共言情境中,审慎明辨是非界限与行为底线^[24]。

当然,仅仅依靠个体的道德自律尚不足以应对复杂的伦理挑战,还需要技术层面的向善设计作为支撑。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和提供者,需要承担起更大的技术伦理责任。这首先要求在人工智能语言模型的设计阶段,便积极引入“价值对齐”理念。在训练数据的筛选和处理上,要投入更多资源识别和减轻数据中存在的偏见。同时,要大力提升人工智能系统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让用户和监管者能够理解人工智能做出特定语言决策的主要依据和逻辑过程,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完全的“黑箱”。然而,所有这些技术层面的努力,其最终目的不应仅仅是造出一个“善”的机器,而应服务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人应当如何与这项技术关联,才能有助于其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25]换言之,在人机共言的语境下,个体应如何“言”,才能在每一次交互中,完成一次朝向本真德性的“行”?

以此为指引,一个健康的社会,还需要通过广泛的公共讨论和适度的法规建设,鼓励并保护这种以“人的成长”为目的的批判性“共言”文化。例如,社会需要深入探讨:在教育、工作与日常交往中,人机

共言的透明度边界何在?当人工智能作为语言代理时,其责任该如何归属?如何制定规范,才能防范“共言”中不易察觉的系统性偏见与操控?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立法机构应及时跟进,为新兴的“共言”实践划定伦理边界与交往准则,以确保“共言”过程的透明性、言说责任的可追溯性,以及对其中潜在话语权力的反思与制衡。这种集体性的聆听,正是对“神性”召唤的应答:它在人机共言的喧嚣中,为那来自“善”与“真”的微弱声音保留了一个敞开的场域,守护着此在对自身存在的“首要的和本真的敞开状态”^{[8]208},以及那份无法被计算的道德分量与人性尊严。

(四)坚守“凡人”:真实交往的回归

坚守“凡人”,是踏上返乡之路的最终一步,也是唯一的方向。而这一方向,意味着将目光重新投向有血有肉的、在具体社会中生活和交往的个体。在人机共言时代,实现这一回归,恰恰需要探索如何通过与人工智能互动,反过来守护和深化真实连接的智慧。这种智慧的核心,便在于将人机“共言”定位为通向本真实践的阶梯,其具体运用可体现为一种“交往前的自我澄清”与“换位思考的辅助”。

这种“自我澄清”,正是为了寻回本真“话语”的根基——确认自己真正有话可说。在许多艰难的交往情境中,个体之所以失语或言不由衷,往往是因为被纷乱的情绪裹挟,未能听清自己内心的声音。此时,个体可以将人工智能当作“树洞”,用以梳理自己面对真实交往时的复杂思绪。正如一项针对聊天机器人用户的研究所发现的,用户之所以愿意向人工智能深度自我袒露,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与人工智能分享没有“社会风险”,因为它具有“非评判性”^[26]。个体可以利用这一特性,在与人工智能的共言中,袒露自己的愤怒、焦虑或不确定感。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借助技术中介来践行原初的“聆听”——首先是聆听自己。通过将含混的内心状态“道说”出来,个体得以更好地审视自身的真实意图与顾虑,澄清自身的“现身情态”,从而为真诚对话寻找到坚实的内在根基。

然而,个体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自我澄清”的局限性,并警惕其潜在的风险。真正的交往并非独白,而是对话。伽达默尔认为对话的本质在于“视域融合”,即两个开放的、具有历史性的有限视域,在语言中相遇、碰撞并生成新的理解的过程^[27]。人工智能作为“树洞”,最多只能帮助个体清晰地描

绘出自身的“视域”,它本身并不具备一个真实的、充满生命体验的“他者视域”。因此,与人工智能的“共言”本质上仍是“自我中心”的演练。若沉溺于此,可能带来两种危险:一是“过度排演”的危险,个体在与人工智能的互动中找到了“最优话术”,并试图在真实交往中“复刻”它,这反而扼杀了对话的生命力与在场生成的可能;二是“同温层”危险,非评判性的人工智能可能无条件地肯定个体的所有想法,使个体带着被强化的偏见进入真实对话,更难对他者视域保持真正的开放。

因此,这种智慧的“共言”必须被严格定位为“预备与演练”,最终目的是为了为了更好地“在场”。虽然人机“共言”往往发生在屏幕两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语言交流的具身性和在场感^[28],但在这种用法中,它也成为了通向更本真的人际交往的阶梯。个体最终选择的,可能不是人工智能提供的“最优”话术,而是一次勇敢的面对面交谈。这正是对自身“能在”的本真抉择:用自己最真实却未必流畅的语言,去表达歉意或关怀。经过与人工智能的对话,个体得以从混乱的情绪与思绪中抽离,从而能在真实交往中更真诚、更勇敢地“在场”,进行不可替代的眼神交流,倾听对方真实的语调,感受超越言辞的氛围。这,才是坚守“凡人”的终极意义:在人机共言时代,以智慧的“共言”为阶梯,守护那个唯有人与人之间才能发生的、神圣的“共同此在”的家园。

四、结 语

人机共言时代的技术现实,深刻地挑战着“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一哲学洞见。人工智能通过消解情感交往的本真性与放大日常思维的沉沦倾向,不断侵蚀着本真“话语”的生存空间,加剧了技术性的“无家可归”之感。由海德格尔“四方整体”思想所启发的“返乡”之路,正是一条回应此种困境、重获本真“话语”能力的整体性生存实践。这一“返乡”并非对技术的拒斥,而是在技术环境中保持清醒的生存论转向与伦理决断,其实现最终有赖于每个个体在日常言说中的持续践行。“返乡”之路并无终点,本文的探讨亦开启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例如,在人机深度共生中催生的全新的“数字栖居”形态、作为对话伙伴的人工智能的独特本体论地位等深层议题,均有待持续探寻与阐明。而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本身,便是栖居于这个时代最本真的方式。

参考文献:

- [1] 陶锋,刘星辰. 从人机对话到人机交往: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哲学反思[J]. 社会科学战线, 2024(5):188-199.
- [2] Pinell P. Do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eak our language?: A Gadamerian assessment of generative language models [J].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24, 77(3): 713-728.
- [3] Kasirzadeh A, Gabriel I. In conversation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igning language models with human values[J]. Philosophy & Technology, 2023, 36(2): 27.
- [4] 高承海,党宝宝,王冰洁,等. 人工智能的语言优势和不足:基于大语言模型与真实学生语文能力的比较[J]. 心理学报, 2025, 57(6):947-973.
- [5] 李佐文,赵鹏. 面向人工智能的语言认知:话语基础与语义计算[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2(2):25-31.
- [6] 海德格尔.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M]//海德格尔. 路标.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366.
- [7] 海德格尔. 返乡:至亲人[M]//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文集: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 [8]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2版.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 [9] 海德格尔. 筑·居·思[M]//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文集:演讲与论文集.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 [10] 海德格尔. 诗歌中的语言:对特拉克尔诗歌的一个探讨[M]//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31.
- [11] 张建云.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情感劳动及其在数字智能时代的实现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5, 45(3):5-18.
- [12] 许苏民. 文化哲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13] 海德格尔. 现象学与神学[M]//海德格尔. 路标.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84.
- [14] 叶圣陶. 精读的指导:《精读指导举隅》前言[M]//朱永新. 叶圣陶教育名篇选.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333.
- [15] 乔姆斯基. 句法结构[M]. 2版. 陈满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2:94.
- [16]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李步楼,译. 陈维杭,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17.
- [17] Dreyfus H L. Why Heideggerian AI failed and how fixing it would require making it more Heideggerian [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07, 171(18): 1137-1160.
- [18] Ekaya O F. Heideggerian Critiqu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ere machines have failed in the human-robots comparison [J]. The Journal of Rare Ideas, 2021, 2(2): 46-58.
- [19] 布尔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190.
- [2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24-525.
- [21] Marschak J. Economics of language [J]. Behavioral Science, 1965, 10(21): 135-140.
- [22] Lemert C C. Language, structure, and measurement: Structuralist semiotics and sociology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9, 84(4): 929-957.
- [23] Leavis F R. Nor shall My Sword: Discourses on Pluralism, Compassion and Social Hope [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72:183.
- [24] 尚人,邹广文. 积极探寻和把控生成式人工智能体的伦理边界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5, 41(3):3-8.
- [25] Vallor S. Moral deskilling and upskilling in a new machine age: Reflections on the ambiguous future of character [J]. Philosophy & Technology, 2015, 28(1): 107-124.
- [26] Skjuve M, Følstad A, Fostervold K I, et al. My chatbot companion: A study of human-chatbot relationship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2021, 149: 102601.
- [27] 伽达默尔. 诠释学 I: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 [M]. 洪汉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1:556.
- [28] 余金红. 拟剧视域下人机互动中的数字化交往 [J]. 青年记者, 2023(20):71-74.

(责任编辑:唐亚蕾)